

华俄道胜银行是近代外国金融势力进入中国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中国政府正式用合同方式承诺的中外合办银行。甲午中日战争后,俄国为了加强对华经济渗透和资本扩张,1895年12月俄法合办在圣彼得堡成立华俄道胜银行。1896年2月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上海设立第一家分行。1896年9月,清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了《中俄银行合同》,以库平银500万两入股华俄道胜银行,股金由该行在俄法“四厘借款”内扣拨支付。华俄道胜银行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铁岭、旅顺、大连、宽城子、长辛店、海拉尔、北京、天津、汉口、伊犁、喀什、宁古塔等地广设分支机构,以东北、新疆和内地为主要活动场所,进行掠夺式经营长达30年之久。华俄道胜银行名义上为中俄“合办”,实际上被沙俄独占,银行的经营管理大权完全掌握在俄方手中,中国无权过问银行的一切事务。华俄道胜银行是沙俄对华进行资本输出的有力工具,除投资修筑中东铁路外,还大量投资于东北的金、煤、铁等矿产资源的开发。



一、华俄道胜银行对东北金矿的投资

1897年6月华俄道胜银行与俄国采金公司组成中国矿藏勘查公司,资本为50万卢布,分为100股。华俄道胜银行总经理罗特什捷英、北京分行经理璞科第为该公司董事会成员。华俄道胜银行与俄国采金公司各按22.5%分发红利,董事5%,其余50%分给股东。1900年1月中国矿藏勘查公司改组为蒙古土谢图汗盟和车臣汗盟矿业股份公司(蒙古矿业公司),开采蒙古金矿。蒙古矿业公司额定资本为300万卢布,分作1.2万股,实收180万卢布。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

斯基、总经理罗特什捷英为该公司董事。该公司从1901年到1903年共产金9367盎司,价值37.7万卢布。1904年至1913年,该公司产金266575盎司,价值960万卢布。1912年,公司资本由180万卢布增至300万卢布^{[1][2]}。

1899年华俄道胜银行与英国人罗斯及吉尔伯特公司成立英俄开拓公司,开采营口到山海关一带的金矿。其中华俄道胜银行100股,英国人罗斯800股,吉尔伯特公司200股。1902年华俄道胜银行收买了罗斯的800股,从而拥有该公司总资本的90%^{[3][4]}。

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出兵中国东北,强占了漠河和观音山金矿。为了达到长期占有的目的,1903年华俄道胜银行副代办宝至德以向清政府缴纳“报效银”为手段,企图使开采合法化,但终未得逞。从1903年起,中国为了收回漠河、观音山金矿多次与俄方交涉。直到1906年10月和1907年2月,华俄道胜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璞科第与哈尔滨分行经理高培里向中国勒索了1.2万卢布后,才向中国政府交还了观音山和漠河金矿^[5]。

华俄道胜银行 对近代东北的矿业投资

□ 郭立彬

在清政府与俄军进行撤兵谈判时,华俄道胜银行代表乌赫托姆斯基、璞科第在北京先后与清政府进行谈判,要求在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前,须先达成华俄道胜银行与中国政府间的“私方”协定,把东北全境的工矿业与铁路的租让权,提供给“中俄合办”的华俄道胜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与清政府间的谈判虽未获得结果,但沙俄与东北三省地方当局的谈判却打开了缺口。1901年沙俄驻江两省办理交涉事务大臣臣巴,与吉林将军长顺订立《开办吉林矿山草约》,允许俄商在吉林各处开采金矿。随后,沙俄与吉、黑两省又订立一系列采矿合同,获得在中国东北广大区域

内勘探和开采金、煤、铁等矿产资源的权力。

1902年11月华俄道胜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璞科第致函外务部,申请开采热河的热水文金矿,但未获批准。1903年6月,又由华商李万芳、于致祺出面设立益华丰公司,招收华股1.5万两,华俄道胜银行附股1.5万两,再次呈报外务部要求开采热水文金矿,也未获批准。

1902年华俄道胜银行与华商梁益诚等人集资40万两,设立义胜鑫矿务总公司,又称奉天矿业公司。其中,华俄道胜银行出资15万两,中国股东15万两,奉天银库5万两。义胜鑫公司申请开采鸡爪山等地的银、铁、煤、铜等矿45处,后清政府同意先行试办鸡爪山等地12处^{[6][7]}。

二、华俄道胜银行对东北煤炭业的投资

在1896年签订《中俄密约》、《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的谈判中,俄国要求在满洲获得煤矿开采权,清政府同意为中东铁路公司提供在满洲免税开采煤矿的权力。在俄方制订的中东铁路章程中规定:“中国政府允许该公司开采煤矿,无论与铁路合办或单独办理。”^[8]1898年,华俄道胜银行北京分行经

理璞科第与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旅大租地条约》,俄国取得了从中东铁路干线修筑一条支线到旅顺、大连的权力,同时,中东铁路

公司正式获准了在满洲开采煤矿的权力。在铁路正式运营后,中东铁路公司又以铁路需用煤炭为名,于1907年8月与吉林、黑龙江两省签订了《吉林铁路煤矿章程》和《黑龙江铁路煤矿合同》,规定中东铁路公司可以开采铁路沿线两旁30里内的煤矿。

抚顺煤炭资源丰富,质地优良,宜于开采。1902年经奉天将军增祺批准,华商王承尧集股银10万两,组织华兴利公司,开采河西千金寨的煤田。同年,翁寿筹资7万多两,设立抚顺煤矿公司,开采河东老虎台一带的煤矿。随后,与华俄道胜银行往来密切的俄籍华人纪凤台以1.3万两股金入股抚顺煤矿公

田最少都锄过四次,有的甚至达到了六次,在政府的引导下,多锄地的耕作方法逐渐被农民接受并推广。

同时边区政府也很重视革新农具,因为这对提高农业技术、增加粮食产量来说举足轻重。据统计,1943年陕甘宁边区已有工具修理厂和农具制造厂八个,以后亦有所增加。这些工厂为农具的革新打下坚实的基

础,为推动农业科技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政府认识到农业科技政策的重要性,为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设立专门机构广纳农林人才为农林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组织考察团进行科学调查为农林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兴水利、引优品、改耕作、革新农具为发展农业提供了具体途径。这一系列政策不仅巩固、发展了边区革命根据地,为赢得抗日战争

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 [1]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 [2]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Z].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 [3]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作者简介:白均堂,陕西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薛婧,陕西科技大学在读研究生。

中国的民间商会兴起于 20 世纪初,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动的产物,而且在很大意义上也

映射着近代中国变动的历史足迹。自 20 世纪 80 年代始,近代商会研究——尤其是近代地域性商会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然而截至目前,这一研究主要以苏州、上海、天津等地为甚,近代辽宁商会的考察和研究则属少见。本文仅就近代奉天商会的沿革和变迁进行考察,以期抛砖引玉。

一、奉天商会的前身——公议会(19 世纪末—1906)

就一般意义而言,商会是商人的团体组织。在商会出现之前,中国商人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公议会,并且相当多的地方公议会后来过渡和改组为新式商会,因此公议会在一定意义上可被看做中国近代商会的前身。而在公议会出现之前,行会是传统中国商业领域中存在的商人组织。行会的功能一般有两个:一是联结同业,增强自卫力量,以便与不利环境相抗争,如反对贪官污吏的勒索、对抗外来商品竞争等等;二是统一行规,如规定生产规模、招工人数、产品价格等。

1861 年营口开港以后,随着东北经济向近代化方向发展,商人和商业经营呈多元化。当时在奉天省经营商业的,不仅有本省商人和外省商人,还有相当多的外国商人,尤其是日本和沙俄的商人。在这种情况下,

奉天商会的变迁

□ 孙强



奉天商会旧址

本地区同业经营者组成的行会对维护商人利益已显力不从心,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来参与商业竞争,公议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大体在同治末年,盛京成立了公议会^[1]。1900 年,大连成立了注口公议会(大连当时称注口)^[2]。1904 年,安东所有工商铺户也成立了“市民公议会”^[3]。

公议会在区域社会中颇具实力和影响。在商业上,公议会不仅管理商务,组织商人统一行动,集体参与竞争,而且左右市场,尤其控制银钱、典当、粮食等行业。在社会生活中,有的地方公议会负有社会的消防、警察之责,有的负责地方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审理,有的替官府征收赋税,甚至发行地方钞票,“俨然如行官府”^[4]。时人所作的《沈阳百咏》描绘说:“众商向立公议会,东西各分四旗,每值祝嘏酬神,则于东南角楼外及攘关外搭台演剧,高插大旗,并书‘奉旨’字样。众商此时往往假威以欺凌民庶,地方官莫如何也。”^[5]官借商势、商借官威、官商勾结,是传统时期中国社会经济领域的固有现象,这一现象表明公议会尚不具备近代民间商会的性质。

二、奉天商务总会与分会(1906—1931)

1901 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中央大员和地方各省主张兴办商务总会以兴商增

税。1902 年,盛宣怀奏请朝廷准设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3 年,天津也成立商务公所。此为中国近代商会的雏形。1903 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并筹划设立商会,颁布《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1904 年,清政府又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规定了商会设立的宗旨、会董的选举方式、商会的活动内容,要求“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稍次之地设立分会”^[6]。1906 年又规定,“嗣后各府、州、县中,如已设立商会而各村镇尚有续请设立者,即令定名为商务分所,与各该处总分会设法联络”。在此过程中,1904 年上海和天津商业会议公所和商务公所率先过渡为商会。

“新政”在东北推行的过程中,按照政府和商部的要求,1906 年 3 月,奉天省设立商务局,派员分赴各地劝办商会。根据 1906 年商部上奏的《商部奏奉天设立商务总会折》所称:“臣部据盛京将军赵尔巽咨称奉天自开办商务总局以来,首以设立商务总会为宗旨,尝向众商推诚布公,设法开导,拟为省城设立商务总会一所”^[7],可知奉天商务总会在此时宣布成立。《东三省政略》也记载奉天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立商务总会。

司,从而使华俄道胜银行掌握了公司大权。与此同时,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吴介臣以加强华兴利公司实力为名,劝说王承尧吸收华俄道胜银行的股金。经王承尧同意,华俄道胜银行代表嘎礼特拉斯夫和闵多夫二人,以“私人”名义向华兴利公司投资 6 万两,其实分三次才缴纳 2.75 万两^[8]。华俄道胜银行成为华兴利煤矿公司的股东。满洲矿业公司也通过华俄道胜银行向华兴利公司投资 5.47 万两^[9]。从此,俄国人完全控制了抚顺煤矿,掌握了煤矿生产经营权,开采的煤炭大多被沙俄用火车运走。日俄战争后,抚顺煤矿被日本占领。

为了垄断东北三省的矿业租让权,沙俄于 1902 年 7 月成立了满洲矿业公司。该公司固定资本为 100 万卢布,其中 2/3 的股票由俄国财政部以私人名义认购,1/3 由华俄道胜银行代表认购。公司股东和俄国财政部、华俄道胜银行都有密切关系。罗特什捷英以华俄道胜银行总裁和“代表”的身份加入了满洲矿业公司。根据满洲矿业公司与华

俄道胜银行的协议,两者除有借贷关系外,在人才与经营上华俄道胜银行也可以插手公司事务。公司的金钱支付由华俄道胜银行负责,并从低收取佣金。公司利润由华俄道胜银行和国家银行平分。满洲矿业公司还以华俄道胜银行的名义对外,实际上是华俄道胜银行的分支机构。满洲矿业公司成立后,组成了三个勘探队,到东北各地进行勘查,以获取开采权益。满洲矿业公司通过华俄道胜银行而获得的租让权有 6 项,在奉天有 3 处,吉林 2 处,黑龙江 1 处。如华兴利公司、英俄开拓公司和奉天矿业公司都是华俄道胜银行转让给满洲矿业公司的。直接以满洲矿业公司名义获得的有夹皮沟金矿、观音山金矿、吉林三姓金矿等。1903 年,俄国国家银行停止发放以公司股票为抵押的放款,满洲矿业公司只能靠华俄道胜银行的贷款勉强支撑。日俄战争后,公司所属企业大多数落入日本人手中,也有的被中国政府收回。

综上所述,在近代中国丧失国家主权的

特殊条件下,华俄道胜银行通过投资于东北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从而控制了东北的矿业生产,大量开采和输出了东北地区的金、煤、铁等资源,获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华俄道胜银行和俄商输入东北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改变闭塞、落后的东北地区经济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近代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居绝对优势地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的特殊情况看,华俄道胜银行投资于东北地区的矿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为东北地区的矿业生产从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过渡创造了条件,推动了东北矿业的近代化,它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矿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雷麦.外人在华投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2]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Z].台北,1960.
- [4] 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路政编(第 17 册)[M].南京,1931.
- [5]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上册[Z].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 ★作者单位:邢台学院政法历史系。